

# 麦积山与庾信铭文

崔 玲

(兰州大学文学院 甘肃 兰州 730000)

【内容摘要】麦积山石窟位于天水城东南四十五公里秦岭山脉西端的丛山怀抱中。它与敦煌莫高窟、山西云冈石窟、洛阳龙门石窟并称为“中国四大石窟”。1961 年 8 月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石窟现存大小洞窟 194 个,从公元 4 世纪末到 19 世纪初的历代雕塑艺术品 7000 余件,壁画 1000 余平方米。尤以保存数量众多的北朝泥塑艺术珍品而闻名于世,被誉为“东方雕塑馆”,古丝绸之路上的佛教圣地。这一艺术宝库,对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宗教、艺术、社会风俗都有着极其重要的价值。

【关键词】麦积山 庾信 铭文

中图分类号:J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106(2005)05-0158-03

麦积山是西秦岭山脉小陇山中的一座孤峰,山高 142 米,崖体三面凌空,岩石构成为距今约 1 亿 4 千万年的紫红色沙砾岩,山形奇特,在群山层层,苍松翠柏之中拔地而起,峰顶呈圆锥状,堆积如农家积麦之垛而得名。据《太平广记》卷三百九十七引《玉堂闲话》云:

“麦积山者,北跨清渭,南渐两当,五百里岗峦,麦积处其中,崛起一石块,高百万寻,望之团团如民间积麦之状,故有此名。”

在我国著名的石窟中,以麦积山的风景最秀美,也以麦积山石窟的山势最险峻。林木葱郁,环境清幽,青山秀水,气候宜人,为秦地林泉胜地。据史料记载,当年修建洞窟时,“自平地积薪,至于岩巅,从上凿凿其龛室神像,功毕,旋拆薪而下,然后梯空架险而上。”<sup>①</sup>直到现在,民间还流传着“砍完南山柴,修起麦积崖”、“先有万丈柴,后有麦积崖”的谚语。

麦积山很早便是陇右名山,历代著名诗人学者赞叹麦积山的名诗佳作,不胜枚举。五代天水诗人王仁裕在《登麦积山诗》真切地写下了他的感受:

蹑尽悬空万仞梯,等闲身与白云齐。

檐前下视群山小,堂上平分落日低。

绝顶路危人少到,古岩松健鹤频栖。

天边为要留名姓,拂石殷勤手自题。

诗圣杜甫也有咏麦积山的《山寺》诗云:

野寺残僧少,山固细路高。

麝香眠石竹,鹦鹉啄金桃。

乱石通人过,悬崖置屋牢。

上方重阁晚,百里见秋毫。

现存有关麦积山最早、最翔实的纪录应该是南北朝著名文学家庾信所作的《秦州天水郡麦积崖佛龛铭并序》。在麦积山石窟东崖下的草坪上矗立着一座高 3.15 米,宽 1.65 米的花岗岩石碑,碑正面雕刻着于右任先生撰书之楹联:“艺并莫高窟,文传庾子山”。这是于右任先生 1948 年读了冯国瑞先生著《麦积石窟志》后,欣然为麦积山石窟题写的楹联。意思是说麦积山石窟的雕塑、壁画艺术足可与敦煌莫高窟石窟艺术相媲美;同时说麦积山石窟因有南北朝文学家庾信的铭文而增色不少,庾信铭文却又因麦积山石窟而传之万世。山以文名,文以山传,二者互映生辉,相得益彰。

《周书·卷四十一·庾信传》曰:

万方数据

“庾信,字子山,南阳新野人也,祖易齐征士,父肩吾,梁散骑常侍,中书令。信幼而俊迈,聪明绝伦,博览群书,尤善《春秋左氏传》,身长八尺,腰带十围,容止颓然有过人者,起家湘东国常侍,转安南府参军时肩吾为梁太子中庶子掌管记,……父子在东宫,出入禁闼,恩礼莫与比隆,既有盛才,文并绮艳,故世号为徐庾体焉……大象初以疾去职,卒,隋文帝深悼之,赠本官加荆、淮二州刺史,子立嗣。”

庾信,生于公元 513 年(梁武帝天监十二年),卒于公元 581 年(隋文帝开皇元年)。他早年出入于梁朝宫廷,善作宫体诗,风格华艳。梁元帝承圣三年(554),他奉命出使西魏,梁亡后被强留在长安,屈仕敌国,因有很高的文学修养,得到西魏和北周的优待,官至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故世称“庾开府”。《周书·本传》云:“世宗、高祖并雅好文学,信特蒙恩礼。”所以他们对庾信“绸缪礼遇,造次推恩。明帝守文,偏加引接;武皇英主,弥相危寄。密勿王事,多历岁年。”庾信虽居高位,内心却非常痛苦,常常想念故国。他擅长诗赋、骈文,前期作品绮艳轻靡,与徐陵同为当时宫廷文学代表,时称“徐庾体”。但后期作品中表现出强烈的乡关之思和羁宦北国的悲愤之情,风格苍劲沉郁。其艺术成就集六朝之大成,对唐代诗歌的发展,产生了颇大的影响。

庾信所作的这篇《秦州天水郡麦积崖佛龛铭并序》是他滞留北朝之时,应秦州大都督李允信(又作李充信)为其亡父造七佛阁之请所作的铭文。关于此事冯国瑞先生在其所著的《麦积山石窟志》中云:

“抑考庾信由长安来秦州,或者为当时秦州大都督李充信之宾客,恰逢在麦积山为其亡父造七佛阁,勒铭崖壁,千载盛事。”

《周书·卷四十一·庾信传》中说“群公碑志,多请相托”,李允信作七佛龛时,请庾信撰写铭文,也是非常自然的。现录于此:

“麦积崖者,乃陇坻之名山,河西之灵岳。高峰寻云,深谷无量。方之鸛鸟,迹遁三禅。誓彼鹤鸣,虚飞六甲。鸟道乍穷,羊肠或断。云如鹏翼,忽已垂天。树若桂华,翻能拂日。是以飞锡遥来,度杯远至。疏山凿洞,郁为净土。拜灯王于石室,乃假驶风;礼花首于山龛,方资控鹤。大都督李允信者,籍于宿植,深悟法门。乃于壁之南崖,梯云凿道,奉为王父造七佛龛。似刻浮檀,如攻水玉,从容满月,照耀青莲。影现须弥,香闻忉利。如斯尘野,还开说法之堂;犹彼香山,更对安居之佛。昔者如来追福,有报恩之经;菩萨去

家,有思亲之供,敢缘斯义,乃作铭曰:

镇地郁盘,基乾峻极,石关十上,铜梁九息。百仞崖横,千寻松直,阴免假道,阳鸟回翼。载攀疏山,穿龕架岭,纠纷星汉,迴旋光景。壁累经文,龕重佛影,雕轮月殿,刻镜花堂。横镌石壁,暗凿山梁。雷乘法鼓,树积天香。嗽泉珉谷,吹尘石床。集灵真馆,藏仙册府。芝洞秋房,檀林春乳。冰谷银砂,山楼石柱。异岭共云,同峰别雨。冀城余俗,河西旧风。水声幽咽,山势崢峒。法云常住,慧日无穷。方域芥尺,不变天宮。

该篇序文首先以简洁而优美的文字描绘了麦积山所处的地理位置,接着又引经据点,形象地描写了麦积山秀美的自然风光和险峻的周围环境。“高峰寻云”语出《淮南子》,“迹遁三禅”,言为高峰插云也。“云如鹏翼,忽已垂天。树若桂华,翻能拂日。”分别出于《庄子》和《楚辞》。《庄子》曰:“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楚辞》曰:“折若木以拂日”。然后,交待了麦积山石窟开凿造像的历史渊源,“锡”乃锡杖之略,为大乘比丘乞食游云必带的十八物之一<sup>②</sup>。文中的“度杯”,实际上就是“杯度”(426),慧皎《高僧传·卷十》载其生平曰:“杯度者,不知姓名,常乘木杯渡来”,此人约为南北朝时冀州人,神力卓越。庾信铭文称“度杯远至”麦积山后,“疏山凿洞,郁为净土”。麦积山开创的时间,约在姚秦。今天虽然已经看不到较早的记载姚秦开创的文字,但据崇祯十五年(1642)姚隆运撰《麦积山开除常住地粮碑》中所记:“麦积山为秦地林泉之冠,其古寺历代敕建者,有碑碣可考,自姚秦至今一千三百余年矣,香火不绝。”可以证明开窟的时间。又慧皎《高僧传》卷十一《玄高传》云:

“(高)母以伪秦弘始四年(402)二月八日生(年十五以后)高乃策杖西秦,隐居麦积山,山学百余人,崇其义训,禀其禅道,时有长安沙门释昙弘,秦地高僧,隐在此山与高相会,以同业友善。”

可知庾信为麦积山撰写铭文时,当时的麦积山寺应是相当繁荣了。

据《晋书·后秦·姚兴载记》曰:姚兴(366—416)既托意于佛道,公卿以下莫不钦伏。沙门自远而至者五千余人。”文中“拜灯王于石室”,即造过去世燃灯佛,就很自然了。现存麦积山石窟第74与第78窟的内容,正是以三世佛为题材的。此外以“驱风”、“控鹤”为喻,意为佛的神通变化,无相无名,并非籍借于风、鹤也。

交待了麦积山石窟开凿造像的历史渊源后,作者笔锋一转,叙写了秦州大都督李允信造七佛龕之缘由及七佛龕之雄伟壮观。“宿植”,佛教术语,宿世所植之善根也<sup>③</sup>。“法门”:佛教术语,为世之则者,谓之法,此法为众圣人道内之通处,故云门<sup>④</sup>。文中“梯云凿道”,即指今天千佛廊和东侧石门外下面通崖前地面的石阶斜廊(现编第一六八窟)实际上都是七佛龕的通道。七佛者,即“毗婆尸如来,尸弃如来,毗叶罗如来,拘楼孙如来,拘那含牟尼如来,迦叶如来,释迦牟尼如来”<sup>⑤</sup>。供奉七佛,等于供奉了所有诸佛,功德最大,祈福最多。李允信所造的七佛龕,即今天编号第四窟的上七佛阁,又叫散花楼,在东崖最高处,据崖前地面50米,横宽31.7米,高15米,进深13米,门外凿走廊,长约30余米,为仿木构建筑的巨型殿窟,上凿单檐庑殿式大顶,前开面宽七间八柱廊檐,后并排凿有七个方型四角攒尖佛帐式大龕,龕内分别供奉一佛二弟子六菩萨或一佛八菩萨;龕与龕之间,作浮雕八部护法相,廊柱两侧有金刚力士;在龕内四壁的上部,各粘贴影塑千佛,计二百余身,正如铭文中所记:“壁累经文,龕重佛影,雕轮月殿,刻镜花堂。横镌石壁,暗凿山梁。”可知石室中“雕轮则皆圆满,刻镜则常净照也”<sup>⑥</sup>。着墨不多但意义深远,遥想当年此窟建成时,该是

何等华丽。此窟是我国现存各石窟中凿有廊窟建筑形象的最大一个洞窟,是最宏伟、最壮丽、最主要的北周洞窟,也是麦积山洞窟中明确见于古籍记载并显赫一时的少数几个洞窟之一。据载,李允信造七佛阁时,曾动人工约四十多万个。

麦积山石窟北周时的造像,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既有北魏中期以后的那种秀骨清像余韵,但又各个体态丰盈,给人以珠圆玉润的感觉。在现实创作中,工匠们运用了以形写神、以传神为主、力求神形兼备的传统表现手法,总体造型概括、洗练,寓丰富于单纯之中,给人以无穷的回味,从而使人得到更高的艺术享受和精神感召。通过对各个造像脸面、坐式、动态、眉目的表情、衣饰和周身轮廓略带装饰性的刻画与描写,不但将那些神情优美的佛和菩萨的温柔、善良、智慧、高洁的情操上的美表现得淋漓尽致,更进一步表现了他们的沉静、庄严和肃穆,从而也就明确地表达了人们对于这些精神主宰的情感、愿望、要求和理想。正如文中所载:“从容满月,照耀青莲”,这两句分别出自《瑞应经》“面如满月色从容”和《维摩经》“目净修广如青莲”,来描述佛像中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庾信以用典的方式,简洁明快地描述了麦积山石窟佛像的艺术特色。

麦积山石窟最具特色的北周壁画当属七佛龕前廊顶部藻井及外门顶壁上的“薄肉塑”飞天。所谓“薄肉塑”飞天,即指凡是飞天人物的四肢、腰身、脸面等裸露的肌体部分,都用一层极薄的优质泥泥浮雕而作,其余部分则全用绘画表现。这种绘塑结合的制作方法,不仅增添了这些飞天的立体效果,给人以呼之欲出和真实生动的感觉,也是整个画面的主体更加突出。反映了我国古代艺术中绘塑同源、绘塑结合相得益彰的优良传统。正因为如此,虽然原凿的崖阁和木构建筑早已塌毁,人们仍将七佛龕称为“散花楼”。这里有一个美丽的传说:这七佛龕是释迦牟尼现身说法的地方。当年第一次讲经时,山谷里,听讲的人做得满满的。为了试试这些人是否真心信佛,28位飞天仙女便决定朝她们身上散花,谁是真心,花瓣就在他头顶上空飞走;如果花瓣落到谁身上,就证明他尘缘未断。于是,她们全都提了花篮,飞出洞窟,竞相向下散起花来。顿时,满天花雨,随风飘舞,却没有一瓣落在众徒身上,可见人人心诚。飞天也称天人。在佛教思想中,凡是好处,皆以天名之,据《大智度论》卷九《放光释论之录》中云:“复次天竺国,法名诸好处,皆名天物”,因为“天”为最好的处所,“天人”也为最好的人。于是又有“天伎乐”、“天女”、“天花”等等。《无垢称经·卷四·观有情品》云:

“室中有本住天女,见诸大人闻所说法,得曾未有,踊跃欢喜,便现其身,即以天花,散诸菩萨大声闻众。时彼天花,至菩萨身,即便堕落,至大声闻,便着不落,时声闻众,各欲去花,尽其神力,皆不能去。”

这篇铭文采用作者最擅长的骈体文形式。《周书·庾信传》说:“当时后进,竞相模范,每有一文,都下莫不传诵”,这是指骈文说的。“徐庾体”的出现,是骈体文完美化最为显著的标志。此篇铭文中,作者运用了对偶、用典、夸张、藻饰等多种修辞手法。如对偶,有数目对,如“方之鹭岛,迹遁三禅。誓彼鹤鸣,虚飞六甲”、“石关十上,铜梁九息”、“百仞崖横,千寻松直”;有运用成语相对的,如“云如鹏翼,忽已垂天。树若桂华,翻能拂日”。有双声对叠韵的:“水声幽咽,山势崢峒”。使人既感觉到均衡的对称美,又感觉到文章的典雅、精炼。从句式来看,具有整齐的建筑美。庾信精于裁对,此文句式虽然整齐划一,但行文并不呆板,因为,他善于使用六四、四六间隔对,使文章有了较大的伸缩余地,比如:“拜灯王于石室,乃假驱风;礼花首于山龕,方资控鹤”、“如斯尘野,还开说法之堂;犹彼香山,更对安(下转第161页)

并不多见,但中古时期却明显不同。究其原因,有三点应值得注意:一是因为此段乱世荒暴之君特多,他们自应受到人民的唾骂与痛恨;二是此段时期封建礼教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民众敢于蔑视至尊,表达愤慨;其三是这些民谣是后人所记,因而无所顾忌,并且还有鉴戒于当世的作用,所以为后来统治者所容纳,并得以保存下来。

其次,民谣还对当时黑暗的官场和贪官污吏进行了讽刺和抨击,反映了真实的社会现实。如西晋惠帝时镇压李特起义的平西将军罗尚,借出征之机,沿途骚扰百姓,所到之处,鸡犬不宁,不得民心,人民对之恨之入骨。当时谣曰:“尚之所爱,非邪即佞;尚之所憎,非忠即正。家成市里,贪如豺狼,无复极已。”(杜文澜,1984)这种贪官污吏比比皆是。如《南史·茹法珍传》记载,茹法珍、梅虫儿俱受东昏侯爱幸,应敕捉刀并专国命,人们谓之“刀敕”。时谣曰:“欲求贵职依刀敕,须得富豪事御刀。”(杜文澜,1984)也就是说要想得到显贵的官位,就必须去巴结奉承茹法珍、梅虫儿这样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刀笔吏”。《魏书·宣武灵皇后胡氏传》更是记载了一群贪官污吏的龌龊嘴脸:“及肃宗践祚,尊后为皇太后,临朝听政。后幸左藏,王公嫔主以下,从者数百人,皆令任力负布绢,即以赐之,多者二百匹,少者百余匹。惟长乐主手持二十匹而出,示不异众而勤劳也,世称其廉。仪同陈留公李崇、章武王融并以所负过多,颠仆于地,崇乃伤腰,融至损脚。”(魏书)真是贪得无厌,丑态百出。于是人民为之谣曰:“陈留章武,伤腰折股,贪人败类,秽我明主。”(杜文澜,1984)当然,胡后并不是什么“明主”,史书记载的她实实在在是一个祸国殃民的“女主”。又如梁文帝萧纲之孙临贺郡王萧正德,横行霸道,夺人妻女,杀戮无辜。百姓为之谣曰:“宁逢五虎入市,不欲见临贺父子。”百姓宁可碰见老虎,也不愿碰到萧正德父子,这些人的暴行真是赛过猛虎。

民谣不仅对贪官污吏予以揭露和嘲讽,还给以无情的诅咒。如咒骂董卓“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杜文澜,1984)用拆字法(“千里草”即“董”;“十日卜”即“卓”)表现对董卓的痛恨,诅咒他早死。咒骂侯景时说“苦竹町,市南有好牛,荆州军,杀侯景。”(杜文澜,1984)

(上接第159页)居之佛。”更重要的是,庾信还善于通篇调配,巧妙地穿插一些虚词,使文气跌宕、抑扬。如本文中,先以“是以”这一虚词引出四四间隔对“飞锡遥来,度杯远至。疏山凿洞,郛为净土。”然后是一六、四四间隔对“拜灯王于石室,乃假驶风;礼花首于山龛,方资控鹤”,接着又以四六间隔对“如斯尘野,还开说法之堂;犹彼香山,更对安居之佛。”最后以“昔者”引出“如来追福,有报恩之经;菩萨去家,有思亲之供”,这样一来,句式显得灵动,读起来也抑扬有致。

骈文中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通过运用典故较含蓄地表达感情,如从序文中末二句“昔者如来追福,有报恩之经;菩萨去家,有思亲之供”就可以看出这一点。这里运用了《佛报恩》经中“一切众生亦曾为如来父母,如来亦曾为一切众生而做父母,欲令一切众生孝养父母”和《盂兰盆经》中目健连度其母于恶鬼趣之典故,这两个典故的共同点就在于都是孝养父母。庾信将它们和大都督李允信为亡父造七佛龛的事巧妙地联系在一起,表达了他自己多重化的复杂的思想感情,一是怀念故国的真挚,二是对家乡和亲人们的无限思念,三是身仕二姓的忏悔和自己报国无门的一腔悲愤。感情表达含蓄而十分确切,令读者有一种沉重的历史苍凉之感。

庾信后期的诗文中,多感伤于自己的不幸遭遇,技巧也更加成熟,他把南方文学的华美绮艳与北方文学的刚健清

第三,民谣的政治指向性还表现在对清明官吏的热烈赞扬和忠心拥戴上。中古时期,社会黑暗,民不聊生,人民群众就把希望更大的寄托在清官廉吏的身上,既表现出自己鲜明的恨,同时也表现出鲜明的爱。如《十六国春秋逸文》曰:“尚书苻雅,为人好施,乞人填门。尝曰:‘天下物何常,吾今日富,后日贫耳。忽一日不施,则意不泰。’”(《十六国春秋》原书已佚,此据《古谣谚》,作者按)。对这样的好官,时人谣曰“不为权翼富,宁作苻雅贫。”(杜文澜,1984)又如《晋书·祖逖传》记载:“帝乃以逖为奋威将军豫州刺史,逖爱人下士,虽疏交贱隶,皆思礼遇之。由是黄河以南,尽为晋土,躬自俭约,劝督农桑,克己务施,不畜资产,子弟耕耘,负担樵薪。又收葬枯骨,为之祭,百姓感悦。尝置酒大会耆老,中坐流涕曰:‘吾等老矣,更得父母,死将何恨。’”(晋书)于是人民为之谣曰“幸哉遗黎免俘虏,三辰既期遇慈父,玄酒忘带甘瓠脯,何以咏思歌且舞。”(杜文澜,1984)表现了对一代“中流击水”的志士和抚爱民众的英雄的由衷热爱。又《梁书·陆襄传》:“大通七年(襄)出为潘阳内史,先是郡民鲜于琛服食修道。大同元年,遂结其门徒,杀广晋令王筠,号上愿元年,署置官属,其党转相诳惑,有众万余人,将出攻郡。襄先以帅民吏,修城隍,为备御,及贼至,连战破之,生获琛,余众逃散。……惟襄郡部,枉直无滥。”(南史)故谣曰:“鲜于平后善恶分,民无枉死,赖有陆君。”(杜文澜,1984)对这样一位治军有方、治民有礼的地方官吏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中古时期民谣对政治的这种指向性,是我们了解当时社会状况,特别是民间生活、思想意识的特殊史料,在我国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 [1]杜文澜.古谣谚[M].北京:中华书局.1984.
- [2]丁福保.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M].北京:中华书局.1959.
- [3]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 [4]李百药.北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
- [5]李延寿.南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5.
- [6]魏收.魏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新结合起来,形成了自己所独有的风格。杜甫说:“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庾信“北迁以后,阅历既久,学问弥深,所作皆华实相扶,情文兼至”。庾信作品之所以能有较高的艺术成就,超出徐陵等人的水平,不能不归结于由于生活环境的改变而引起思想感情的变化。

麦积山不仅有精湛的艺术、秀丽的景色,更有以庾信铭文为代表的一大批传世题咏佳作,为研究中国古代佛教艺术、哲学、民俗留下了一份难得的实证资料。于右任先生1948年撰书之楹联:“艺并莫高窟,文传庾子山”正是对麦积山石窟的客观评价。今天,深藏于陇山深处的这颗文化艺术明珠,已经愈来愈受到世界的重视。

注释:

- ①《太平广记》卷三百九十七《山类》《麦积山》条。
- ②《简明世界宗教词典》。
- ③《大藏经》卷九《妙法莲花经》卷第七曰:“宿植德本,众人爱敬”。
- ④《大藏经·卷二·增壹阿含经》曰:“如来开法门,闻者得笃信”。
- ⑤《大藏经·卷二十二·四分律比丘戒本》。
- ⑥《庾子山集注》卷十二。